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

— 清末民初小说研究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207.4
C528-3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27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

— 清末民初小说研究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陈平原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

(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7-301-09540-6

I. 中… II. 陈…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清后期~民国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8457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

著作责任者: 陈平原 著

责任编辑: 张凤珠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540-6/I·075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sw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开本 11.75 印张 300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 20 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

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

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新版序言

陈平原

这是一册旧书，原名《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之所以“改头换面”，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原书初版于1989年，乃设想中的七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开篇”。很可惜，课题组同人鞍马劳累，各有各的学术兴奋点，始终无法集中精力，完成此拟想中的大书。眼看十多年过去了，第二册还在酝酿中，何时能成完璧，实在不得而知。出版社于是转变策略，劝我将此书单独刊行。说是日后全史若能成编，再让我打点行装，重新归队。

好在此书本就体例独立，首尾完整，论述上也颇具特色；以今日眼光重读一遍，感觉上似乎还没完全过时。故此，旧貌换新颜，也还说得过去。

阅读本书，有个诀窍，那就是参考附录《〈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此文原入拙著《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2005年），只因与本书关系实在太密切，不得已重新收录。在此文中，我着重

谈了小说史的体例、小说史写作的重心、小说史研究方法等三个问题,而严家炎、钱理群、洪子诚、吴福辉等课题组同人也都各抒己见(黄子平因人在国外,没有参加)。那次讨论相当深入,对于如何撰史,各人体会并不一致,其中的缝隙,很值得玩味。

这则“讨论纪要”,是由我根据录音整理,请大家过目,再送出去发表的。先是以《小说史体例与小说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的面目,出现在《文学评论家》1990年4期上;因排印中出现了不少错误,杂志社不好意思,改题《论小说史体例》,重刊于1991年1期。如此难得的“校订本”,又为《新华文摘》1991年5期所转载。另外,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第4号(1990年10月)上,也刊发了此文。

本书正式出版后,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以下几则书评,大体代表了那个时候学界的主流意见。其中,钱理群的《小说史研究的新视域》(《读书》1990年7期)、谷梁的《崭新的史识开拓——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文汇报》1990年10月27日)、李庆西的《文化、诗学和叙事方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的两个问题》(《上海文论》1990年6期)、解志熙的《文学史的新写作及其理论问题——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2期)、刘纳的《有意义而有意思的工作——也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2期)等,都给予本书很高的评价,同时提出若干批评或建议。而在所有书评中,我最想提及的,是刊于《人民日报》1990年5月23日的《昔风旧雨话“小说”》。那则短文的作者署名“仲远”,实则是英年早逝的亡友吴方——屈指算来,吴兄谢世刚好十年!

想当初,晚清小说的研究相当薄弱(不像今天这样,俨然成为显学),可供参阅的著作不多。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与《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等,固然是常读常新;杨世骥的《文苑谈往》、中村忠行的《清末探侦小说史稿》、米列娜的

《世纪转折期的中国小说》，以及胡适谈《官场现形记》、夏志清论《老残游记》、钱锺书评林纾翻译等文章，还有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等，也都给我提供实质性的帮助。限于体例，本书初版时未列书目；此次重刊，除了补上参考文献，还对若干不规范的注释做了调整。至于正文，则不做任何改动，以存那个时代的学术风貌。

正是在修整注释时，发现了一大问题：不列参考书目，无意中抹煞了好些先辈的辛劳，实在不应该。郑方泽编《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因系工具书，学者一般不会引用；可我最初进入晚清文学领域时，得益于此书良多。王俊年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书后附《中国近代小说论著索引（1919—1949）》，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虽然此前我已出版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以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与夏晓虹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对清末民初的小说状态比较熟悉；但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吴趸人研究资料》《孽海花研究资料》以及《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仍然是我写作中经常翻查的书籍。值此旧著重刊之际，特向上述没有进入“索引”的前辈学者表达敬意。

米列娜编《世纪转折期的中国小说》，对我研究思路的形成颇有影响。最初是伍晓明兄向我推荐此书，并将其译本的初稿借我参考。有此译稿（该书的中译本，1991年方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垫底，我对米列娜英文原著的理解，方才比较深入。虽然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自序》中，我曾对伍兄表示了谢意；但在本书中没有任何说明，还是不妥。

日本大阪经济大学教授樽本照雄对本书关爱有加，专门为其制作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索引》，刊于1991年3月出版的《大阪经大论集》第200号（385—430页）。当年编制索

4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

引,只能手工制作,樽本先生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这让我十分感动。有了这份索引,我才发现本书的不少错漏,并得以在第二版中及时校正。此次新刊,将樽本先生制作的索引略为删改,附在书后,以便读者查阅,也借机向樽本先生致谢。

2005年7月2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1)
新版序言	(1)
第一章 新小说的诞生	(1)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2)
第二节 新小说演进的动力	(8)
第三节 新小说群体的形成	(16)
第四节 新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 起点	(20)
第二章 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	(24)
第一节 开眼看世界	(25)
第二节 意译为主的时代风尚	(34)
第三节 翻译小说的实绩	(43)
第四节 接受中的误解	(54)
第三章 商品化倾向与书面化倾向	(66)
第一节 小说市场的拓展	(67)
第二节 小说家的专业化	(77)
第三节 新小说的商品化倾向	(83)
第四节 新小说的书面化倾向	(91)
第四章 由俗入雅与回雅向俗	(98)
第一节 在雅俗、新旧之间	(99)
第二节 由俗入雅——梁启超们的救世说	(104)

第三节	回雅向俗——礼拜六派的消闲说·····	(113)
第四节	雅俗并存局面的初步形成·····	(121)
第五章	集锦式与片断化 ·····	(128)
第一节	珠花式的结构类型·····	(129)
第二节	集锦式的结构类型·····	(136)
第三节	短篇小说的重新崛起·····	(148)
第四节	盆景化与片断化·····	(154)
第六章	文白并存的小说文体 ·····	(163)
第一节	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消长起伏·····	(164)
第二节	白话小说与方言小说·····	(170)
第三节	古文小说与骈文小说·····	(182)
第四节	“别具一种姿态”的译本文体·····	(192)
第七章	从官场到情场 ·····	(199)
第一节	“忠奸对立”模式的消解·····	(200)
第二节	“官民对立”模式的转化·····	(208)
第三节	无情的情场·····	(217)
第四节	三角恋爱模式的文化功能·····	(227)
第八章	旅行者的叙事功能 ·····	(236)
第一节	启悟主题与整体感·····	(237)
第二节	补史之阙与限制叙事·····	(241)
第三节	引游记入小说·····	(246)
第四节	旁观“民间疾苦”·····	(252)
第九章	实录、谴责与感伤 ·····	(258)
第一节	从写实到实录·····	(259)
第二节	从讽刺到谴责·····	(267)
第三节	从悲壮到哀艳·····	(274)
作家小传	·····	(282)
小说年表	·····	(296)
参考文献	·····	(312)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	(318)
索引·····	(330)
卷后语·····	(362)

第一章 新小说的诞生

- 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 新小说演进的动力
- 新小说群体的形成
- 新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

二十世纪初年，一场号为“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新的一页。“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虽然直到1902年才由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正式提出，但戊戌前后文学界对西洋小说的介绍、对小说社会价值的强调，以及对别具特色的“新小说”的呼唤，都是小说界革命的前奏。因此，新小说的诞生必须从1898年讲起。也就是说，戊戌变法在把康、梁等维新派志士推上政治舞台的同时，也把新小说推上了文学舞台。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为新小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提供了重要阵地。此后，刊载和出版新小说的刊物和书局不断涌现，新小说始蔚为奇观。作为文学运动的“小说界革命”和作为这一运动实绩的“新小说”，这两者当然密不可分；用“小说界革命”的理论主张来诠释“新小说”的创作，也是完全可

以理解的。可这两者之间并不能划等号,除了理想与现实、理论和实践必不可免的距离外,更因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是维新派为配合其改良群治的政治运动而提出的。虽然其基本主张适逢其时,很快打破了政治上党派的局限,得到文学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欢迎;但这一时期有成就的新小说家,并非都毫无保留地站到“小说界革命”的旗帜下。因此,在讨论“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时,着眼点主要落在梁启超等倡导者的主张和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一时代的文学风尚;而在考察“新小说”的成败得失时,却着眼于整个文坛的发展趋势,以及受时代风尚影响但又不局限于时代风尚的主要作家的创作倾向。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革命”一词,在晚清使用频率甚高。除“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种族革命”、“伦理革命”、“家庭革命”等流传颇广的专门术语外,文学界还有“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鼓噪一时的口号。“革命”在这里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代易姓,^①而是借自日本的新名词,意指促使事物从旧质向新质飞跃的重大变革。就像“自由”、“平权”、“物竞天择”等新名词一样,“革命”也是晚清新学之士最喜欢的口头禅,以至小说中颇多漫画化的描写。比如《文明小史》中的贾子猷(假自由)、贾平泉(假平权)、贾葛民(假革命)和《负曝闲谈》中的李平等、黄子文等,都是靠讲“革命”吃饭的无耻之徒。讲“革命”不但不流血,还能讲出好处来,可见“革命”已成为时代风尚。而这种风尚的深层意识,即是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以及求变求新的强烈愿望。像邹容《革命军》之主张民族革命,或者《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黄克强、

^① “革命”一词起源于《易·变》：“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李去病之争论政治革命是否可行,那是有明确界定的政治主张;而晚清大多数新学之士挂在嘴边的“革命”,却相对空泛得多,只是表达一种情感志向。正因为其空泛,诠释的余地很大,同是讲“革命”,很可能相去甚远。反过来,政治倾向很不相同甚至互相攻击的新小说家,在关于小说的功能、表现特征以及发展趋向等理论主张上,并不曾势不两立。这除了说明新小说的发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独立运行,并非简单的只是政治斗争或党派利益的工具外,更证明“小说界革命”口号的提出,适应了晚清文学界求新求变的潜在要求,故能一呼百应。

“诗文代变”的说法古已有之,晚清的特点是借助“进化”的观念来重新评估、甚至有意识地促成某种文体的升降沉浮。^①而所谓“进化”的阶梯,实际上是借用域外文学的标准来描述的。也就是说,不再只是中国文学内部各种文体的嬗变,而是中国文学在域外文学冲击下所作的结构性调整。这种调整,不只涉及诗歌、散文,而且牵涉到戏剧、小说。

从1899年开始,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梁启超依次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②和“小说界革命”^③的口号,并认真付诸实践。这三个口号互相关联,其共同主旨是师法域外文学,改造乃至重建中国文学。“诗界革命”的要求是“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④“文界革命”的起点则应是“善以欧西文思”入文;^⑤而“小说界革命”口号的酝酿,更直

① 佚民:《〈新小说〉叙例》(《大陆报》2卷5号,1904年)云:“小说新新无已,社会之革变无已,事物进化之公例,不其然欤?”

② 这两个口号分别于1899年12月25日、28日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参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③ 梁启超等人所理解的小说概念实际上包括戏剧,故“小说界革命”也包括“戏剧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口号始见于1902年11月出版的《新小说》创刊号《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④⑤ 《夏威夷游记》。

接导源于欧美及日本的政治小说。新派诗中的“新意境”、新文体中的“欧西文思”和新小说中的“政治小说”，后来都逐渐消退；可由此引入的众多域外文学成份，却就此融入中国文学中，并促成了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的一系列变革。在这一时期的所有文学变革中，“小说界革命”成效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

小说界之必须革命，基于梁启超等人对于小说功用的认识，以及对传统章回小说的估价。而此中还蕴藏着中外小说比较这一潜在的因素——不管是骂还是捧，晚清小说理论家在谈论传统小说时，都自觉不自觉地借用域外小说作为比衬的背景。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们的见解超越了明清文人关于小说价值的争论。康有为之希望“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泰西尤隆小说学哉”；^① 严复、夏曾佑之主张“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是因为“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② 梁启超之力倡译印政治小说，也是因为西哲有言：“小说为国民之魂。”^③ 西方小说何曾真的“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④ 不过没必要过分认真看待这种“理解的偏差”，倘若不是采用如此夸张的语调，历来被视为小道小说，也不可能在此如此短的时间内一跃而为救国济民的利器，焉知梁启超们不是为了提倡小说而故意制造一个西方国家以小说立国的“神话”？关于这一“神话”的最有影响的表述，是梁启超发表在1898年12月《清议报》第一册上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可其基本雏形在前一年严复、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

①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日本书目志》，大同译书局，1897年。

②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1897年10月16日至11月18日。

③④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一册，1898年。